國際人權的擴散與實踐：以《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為例*

蔡 育 岱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權力與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探討因素，也是國際關係學界戰後研究的起點，本文認為「權力」決定「國家利益」，進而限制「國家行為」的觀點，在國際人權規範下未必依舊是當代國際政治與國家行為的鐵律。從冷戰後國際社會的維持和平行動來看，有相當程度國家武力干預並非出於國家利益的動機，亦非與地緣戰略有關，而只是為了去維持國際社會的價值，一種強調人權價值、避免種族淨化的發生。這種國際社會的價值（人性尊嚴、法治、民主），某種程度存有所謂規範制約權力的成分，強調權力的使用來自合法性，而這規範的形塑來自理念的建構。

對一些國家而言，在乎的可能不是體系結構，也不是權力平衡，抑或物質宰制一切，而是如何維持國際社會的價值，並運用理念來操作規範，進而達成對其國家真正的利益。爰本文將重新檢視國際社會中規範、理念與權力的作用，並以《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為例，從其內涵與法源基礎論證後冷戰迄今，國際社會並非完全制約在現實主義權力操作下的國際結構因素，而是受制於國際社會中一種價值的規範因素。

關鍵詞：國際人權、人道干預、保護責任、規範、理念、人類安全

* * *

* 本文對於《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之相關探討，係來自作者主持之國科會計畫（NSC98-2410-H-194-031; NSC99-2410-H-194-038）兩部之構想。「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俗稱爲 R2P，是新興的國際規範概念，由 2001 年「干涉與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提出，內容是表明國家有責任保護其國民免於被滅絕種族、違反人道以及種族淨化，一旦當國家無力保護其公民時，保護責任就落在國際社會身上。換言之，R2P 重新詮釋了國家的主權意涵：國家的主權有一種保護其所有公民的責任。相關資料請參考 ICISS 網址：http://www.iciss.ca/menu-en.asp 或本文第參與伍部分。

壹、前　言

權力（power）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探討因素，也是國際關係學界戰後研究的起點，①不論是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或是以結構爲核心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從 Edward H. Carr、Hans J. Morgenthau 到 Kenneth N. Waltz 皆有精闢的詮釋。尤其對於權力在界定利益的概念上，係以權力爲核心而開展的國際關係政治論述，並以客觀的物質主義本體論（Ontology）爲始點，將國家視爲理性的行爲單元（unit），基於生存和安全的考量，必須透過權力的取得作爲自助方式的根本，強化自身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和利益。其中，古典現實主義者從國家追求權力和權力政治的邏輯出發，而新現實主義則以國際政治的結構制約國家的行爲與互動模式，使得物質式的權力成爲最有效的自助方式，甚至是維持國家間秩序的一種力量。②

相較之下，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學者 Robert O. Keohane 與 Joseph S. Nye, Jr.則試圖將權力還原爲利益，承認權力和利益的重要性外，並將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因素挹注入國際政治的探討中。③使得「權力」、「利益」與「制度」三者成爲解釋國際政治的物質因素。不過晚近隨著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興起，使得理念（ideas）因素嵌入了國際體系的結構中，成爲學者在分析國家利益時亦需參考與操作的選項。④尤其權力的分配可能只是影響國際在戰略上的估算，如果要發生作用還需依靠知識分配（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尤其在冷戰期間，如果沒有對手競爭的威脅關係，造成相互指責的身分確認，那麼美蘇兩個國家間可能就無法確定其利益應該爲何？⑤不過建構主義並非否認實力和利益的重要

註①　Alexander E.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2.

註②　相關資料請參考：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Macmillan, 195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註③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1988）, pp. 379~396;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 Westview, 1989）;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New York: Longman, 2001）.

註④　按 Wendt 說法，其實早在 1950 年代學者 Snyder、Bruck、Sapin 等人就以類似理念的「知覺」（perception）因素探討國際政治中的外交決策議題。Wendt, *op. cit*., p. 92; Richard Snyder, H.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註⑤　例如 Wendt 舉出古巴與加拿大對美國的關係、社會與大學對教授的關係。Alexander E.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1992）, pp. 397~398.

性，而是強調國際政治的社會性質創造了行爲者間的規範共識，調和了價值觀、期望與行爲，不同於權力在界定利益的概念，反而是規範塑造了利益，而利益塑造了行爲。⑥

尤其在國際人權的議題上，所展現的國際規範與實踐更是如此，國家對於人權理念維護來自於社會實踐過程的建構。這些認同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互動過程中，能動者（agent）往來模式的變化與所處環境的改變，而有所調整。故本文認爲權力決定國家利益，進而限制國家行爲的觀點，在國際人權規範下未必依舊是當代國際政治與國家行爲的鐵律。從冷戰後國際社會的維持和平行動來看，有相當程度國家進行武力干預並非出於國家利益的動機，亦非與地緣戰略有關，而只是爲了去維持國際社會的價值，一種強調人權價值、避免種族淨化的發生。這種國際社會的價值（人權、法治、民主），某種程度存有所謂規範制約權力的成分，強調權力的使用來自合法性，而這規範的形塑來自理念的建構。

對一些國家而言，在乎的可能不是體系結構，也不是權力平衡，抑或物質宰制一切，而是如何維持國際社會的「價值」，並運用「理念」來操作「規範」，進而達成對其國家眞正的利益。緣此，本文試圖以國際人權的角度來探析國際規範的擴散與實踐，強調當代人權政策除了是理念對利益的展示外，理念與話語權力（power of discourse）在國際人道干預上的改變與操作，⑦亦展現了理念在重構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力量，對人權政策的採納，不代表對國家利益的忽略，而是反映了國家的固有利益產生變化，儘管國際規範結構是由最強者建構，但整體來說，有關人道干預的規範結構並不完全服務於最強者的利益，而是來自理念的建構。

爰本文將重新檢視國際社會中規範、理念與權力的作用，並以《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的倡議爲例，從其內涵與法源基礎論證後冷戰迄今，國際社會並非完全制約在現實主義權力操作下的國際結構因素，而是受制於國際社會中一種價值的規範因素。

貳、規範、理念與權力的檢視

對於權力本質的運作與探討，主流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不分新舊流派分別引入大量文獻分析，近代則由於建構主義的興起，使得規範、認同和理念因素嵌入了國際體系的結構中，成爲學者在分析國家利益時亦需參考與操作的選項。誠如

註⑥ Martha Finnemore, “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7~158.

註⑦ 固然國際人權法（human rights law）與國際人道法（humanitarian law）係屬兩個不同法體系，但本文此處刻意地不加區分，乃是認爲《國家保護責任》的提出，除了重新詮釋兩者的關係外，又連結了兩者在形塑保護人類責任的規範部分，尤其是在討論「人權侵犯」（human rights violation）問題上。

學者 Martha Finnemore 所言，只要權力牽涉到規範，兩者的關係就沒有那麼單純簡單。⑧

針對現實主義學者秉持「權力界定利益」的研究方法，建構主義學者則認爲國家對權力的看法與詮釋有可能是屬於自我的認定，有些國家視物質（軍事、經濟）爲權力的展現，有些則以理念（價值）在形塑規範。換言之，權力與理念同時具有對體系建構規範的能力。在權力的運作過程中，國家利益是國家外交政策背後主要操作因素，然而按現實主義結構制約的觀點，目前的國際政治、國際社會也唯有美國，或頂多是中國、俄羅斯、歐盟等尚有以權力操作此能力。相較之下，在國際社會的文化環境上，⑨絕大多數國家可能就只能遵循國際規範，並採理念來運作外交政策，藉以符合其國家利益。⑩

對一國的外交政策而言，若採學者 Jack Donnelly 的模式可分爲「安全、經濟、人權與其他」四種利益。Donnelly 指出儘管沒有國家會犧牲安全來維護人權，但是後冷戰時代，隨著安全議題在絕大地區趨向緩和，使得人權在安全之下並非呈現一面倒的情況，至於經濟與人權對國家利益而言，則是有出現人權優於經濟的現象，例如 1989 年中國六四事件後各國對其的經濟制裁，以及 1990 年代荷蘭因東帝汶抵制印尼的外援等。⑪然而，早在冷戰期間，歐洲地區人權議題就已形塑了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共生氛圍，⑫這是因爲歐洲在經歷大屠殺與戰爭後，導致了理念上的變革，直接反映在政策影響上，對歐洲人來說，人權問題其實就是如何在防止大屠殺的產生。⑬換言之，在歐洲政治格局上並不符合傳統如 Morgenthau 所言「對人權的辯護無法一貫的應用在外交政策上，因爲它將與其他利益牴觸衝突，並且比人權來得重要」。⑭相較之下，歐洲對於規範、理念與權力的關係，則透過「柔性強權」（civilian power）或「規範強權」

註⑧　*Supra* note 7, pp. 153~185.

註⑨　這種國際社會層次，除了具有正式建制的機制（例如 NATO、OSCE、WEU）、主權規則與國際法規範外，敵對（enmity）與友好（amity）的國際模式也主導著國際環境的社會。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E.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4.

註⑩　這或可證明國際社會中的一些所謂「中型強權」（middle power states），例如加拿大、澳洲、北歐國家等會服膺以「人權」、「人類安全」爲主軸的外交政策。

註⑪　Jack Donnell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3.

註⑫　早在 1975 年「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就達成了《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Helsinki Final Act），是最早一份與人權相關的安全協議。

註⑬　Kathryn Sikkink, "The Power of Principled Ideas: Human Rights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Europe,"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9~168.

註⑭　Hans J. Morgenthau, *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 1979）, p. 7.

（normative power）的操作，⑮達到對人權規範的建構與維護。對此，按本文主旨：國際社會的價值中（人權、法治、民主），某種程度存有所謂規範制約權力的成分，強調權力的使用來自合法性，而這規範的形塑來自理念的建構。而所謂國家要普遍接受規範現象，依照 Alexander E. Wendt 觀點來自三種可能性：分別是強制（coercion）、自利（self-interest）與合法性（legitimacy），而這也是規範得以內化的三種程度。⑯

秉承 Wendt 對於解釋遵守規範現象的觀點，本文試圖以國際人權規範內化爲例，如（表 1 國際人權規範內化程度分類），將國際人權規範內化程度「強制」、「自利」、「合法性」三者再細分類爲：「解釋定義」、「實質內涵」、「事實分類」、「國際人權規範內化程度事例」，以及「國際人權規範中有關 R2P 內化過程」⑰五類，用以彰顯規範形塑過程中的意涵與變化。

首先，第一種「強制」程度表示國家遵守規範是由於他們受到其他權力較強國家的強迫。這樣的人權規範可分爲兩類，一類是爲維護人權採取行動的國家，包含人道干預等軍事行動、經濟制裁，這類國家基本上對於人權規範的認知，往往是屬於自利或是合法性程度的國家，例如美國、歐盟等國，當然出於干預的動機與藉口是可以被挑戰與質疑的，例如西方強權想利用人道主義來遮掩其實際現實的政治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物質力量比共有理念或許更有解釋力，物質與理念因素兩者是同時可以存在來討論。另一類是被強制規範的國家，雖然國家能認知到規範的存在，但卻是出於外力脅迫才服從，而非自願性的，例如交付出戰爭罪犯的國家（塞爾維亞、盧安達）、受歐盟行使「規範權力」的非洲國家（剛果、查德、中非共和國、蘇丹等）和主權受一定程度干預的盧安達、南斯拉夫、科索沃等。其次，第二種「自利」程度國家會衡量違反規範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國家遵守規範是由於這樣會符合其外生給定的利益，這是屬於自利內化途徑下的能動者，他們是出於自我利益的考量而主動選擇服從國際人權規範，進而成爲自利下規範國，譬如歐盟 2004 年東擴成員（匈牙利、波蘭、捷克、斯

註⑮ 有關「柔性強權」或「規範強權」資料可參考 Felix Berenskoetter and M.J. Williams e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Routledge, 2007）或中文期刊：甘逸驊，「歐盟柔性強權身分認同的建構與批判」，**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5 皆有詳細的分析。

註⑯ 第一種內化途徑爲傳統現實主義解釋國家爲何會追求安全與權力政治的原因。能動者在此一內化程度下雖然能認知到規範的存在，但卻是出於外力脅迫才服從，而非自願性的。第二種內化途徑爲新自由制度主義對能動者行爲的解釋，基礎在於能動者不但能夠對現有規範有所認知，也認同服從規範是符合自我利益的表現；換言之，自利內化途徑下的能動者是出於自我利益的考量而主動選擇服從規範。第三種內化途徑是社會建構主義解釋能動者爲何會遵守規範的原因。在合法性內化途徑下，能動者對規範的遵守不是出於外力的壓迫，也非爲了從中獲利；而是認爲規範具有合法性，所以願意自我設限接受規範對自我的要求，使能動者與結構的規範間存在一種認同的關係。Wendt 認爲只有達到此一程度的內化，規範才能對能動者產生建構的作用，而在此之前能動者的行爲是同時受到不同程度的理念規範與物質結構的影響，因此一旦物質結構產生變化，就會使現有的結構發生變化。由於在此內化途徑中的能動者，能夠將規範完全內化至能動者的理念之中，因此對規範的服從度相當高，也會強烈抵制規範的變化使結構達到最高的穩定性。相關資料請參考：Alexander E.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85~290.

註⑰ 此處有關 R2P 內容，尚留待本文第參部分再行分析。

洛伐克、斯洛維尼亞、馬爾他、塞浦路斯、愛沙尼亞、立陶宛與拉脫維亞)，爲了自利加入歐盟，必須遵守入會的「民主、法治、人權」標準。又如早期爲了加入聯合國成爲國際社會一員，故宣示願意遵守《聯合國憲章》與宣示《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

表 1　國際人權規範內化程度分類

程度	強制		自利	合法性
解釋定義	國家遵守規範是由於他們受到其他權力較強國家的強迫(這種情況下物質力量或許比共有理念更有解釋力)		國家遵守規範是由於這樣會符合其外生給定的利益	國家遵守規範是認同這樣的規範是合法性的
實質內涵	國家會遵守規範行爲是不自願或不符合自身利益		國家會衡量違反規範是否符合自身利益	國家認同這些規範，並希望遵守規範
事實分類	**行使規範國**	**被規範國**	**自利下規範國**	**規範內化的自律行為者(self-regulating actors)**
國際人權規範內化程度事例	採取人道干預等軍事行動、經濟制裁的國家	主權受一定程度的被干預(塞爾維亞、印尼)	加入聯合國並宣示願意遵守《聯合國憲章》、宣示《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	簽署並批准《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消除種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公約國家
	成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國際法院」	交付出戰爭罪犯的國家(塞爾維亞、盧安達)	簽署《歐洲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美洲人權和義務宣言》、《美洲人權公約》、《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憲章》的國家	簽署並批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與「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渥太華公約》
	歐洲聯盟透過「柔性強權」或「規範強權」操作在非洲國家的外交政策上	受歐盟行使「規範權力」的非洲國家(剛果、查德、中非共和國、蘇丹等)	在《歐洲憲法條約》、《里斯本條約》下的歐盟會員國或是東擴成員(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馬爾他、塞浦路斯、愛沙尼亞、立陶宛與拉脫維亞)	在其國內憲法內容對人權的宣示維護(歐盟等國、美國、英、法、德、日本、中華民國…等)，以及擬定所謂配合生效的施行法
	配合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國家(加拿大、EU、NATO等成員)	主權受一定程度干預(盧安達、南斯拉夫、科索沃)	爲得到國際援助而強調有意遵守人權的失敗國家(烏干達、海地、索馬利亞)	2005年高峰會議聯署《國家保護責任》的150個國家，以及通過有關「保護責任」的A/RES/60/1號決議
國際人權規範中有關R2P內化過程	1991年安理會的688號決議與1992年794號決議、1999年NATO轟炸南斯拉夫	干預伊拉克、索馬利亞、塞爾維亞	加拿大政府致力於人權建制的擘建，將「人類安全」定爲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建立「干預和國家主權委員會」(ICISS)，以及對R2P報告的提出	2009年9月14日，聯合國大會決議A/RES/63/308號138、139段中有關「保護責任」的內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再者，第三種「合法性」程度國家遵守人權規範，是因爲認同這樣的規範是合法性的，國家認同這些規範並希望遵守規範，成爲規範內化的自律行爲者(self-

regulating actors)。他們對國際人權規範的遵守不是出於外力的壓迫，也非爲了從中獲利，而是認爲人權規範具有合法性，例如簽署並批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與《渥太華公約》(Ottawa Convention) 的國家，或在其國內憲法內容對人權的宣示維護 (歐盟等國、美國、英、法、德、日本、中華民國……等)，以及擬定所謂配合生效的施行法，此類國家之所以對人權維護，並非出自於可以獲利或是被迫，而是將人權規範完全內化至能動者的理念之中，因此對規範的服從度相當高，也會強烈抵制規範的變化使結構達到最高的穩定性。最後，作者在表 1 所要表達的是儘管物質權力很重要，但國際人權規範在各國相互交往中，一旦透過協議和習慣形成與認可的規範後，由國家單獨或集體強制予以實施，將逐漸形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則、制度和規則。而這些規範是國家藉由對話與共識來形塑利益與制度，國家的共同利益是維持這些規則與規範的重要力量。⑱

雖然物質結構有助於理念結構的產生，但是對於物質結構的解讀還是有賴於能動者的自我詮釋。⑲故 Wendt 表明「權力與利益之所以具有實際上的作用，主要是因爲造就權力和利益的理念起了作用」。Wendt 亦同時表示國際政治中權力的分配意義很大程度是由利益分配建構，而利益的內容很大程度又是由理念建構成，如圖 1。⑳其中「共同思想模式」(shared mental models) 的共同價值觀建立，會隨著相處時間增長，接受相同訊息後，造成歸屬於理念的制度與規範的客觀社會事實。㉑換言之，人權建制成立的背後動機與動力，某種程度不在於物質或權力因素，而是來自人權理念起了作用。此外，這種人權理念的擴散 (diffusion) 可視爲一種社會學習、具社會化的機制，在國際人權理念規範嵌入國內的過程，是具有能動、漸進、由外向內傳播的現象，當國際人權規範擴散至國家，在國家呈現的反映 (抵抗或服從) 中不斷建構身分、形塑認同，最後尋找出國家接受的路徑利益。㉒

註⑱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84);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註⑲ 以梵蒂岡爲例，在物質上非屬大國，但在宗教的理念上就是國際社會的強國。對其國家利益而言並非是領土的擴張，而是廣泛教義的傳達。

註⑳ Wendt, *op. cit.*, p. 135.

註㉑ *Ibid.*, pp. 96~113.

註㉒ 擴散 (diffusion) 是建構主義在規範問題上的一項重要概念，它是一種社會學習、具社會化的機制，係指國際體系外在規範嵌入國內的過程，是具有能動、漸進、由外向內傳播的現象。相關資料請參考：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2004), p. 242; Vlad Kravtsov, "Understanding Norm Diffusion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Build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Sawyer Law and Politics Program*, December 9, 2005, pp. 1~27; Jeffrey T. Checkel,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1 (1999), pp. 84~91;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87~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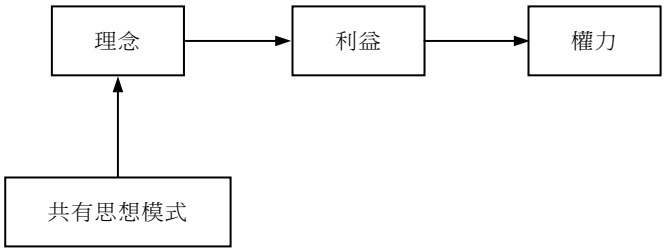

圖 1　Wendt 路徑利益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96-113.

以加拿大對國際人權維護爲例。加拿大分別在 1999、2000 年擔任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其間 1999 年 3 月，經加拿大政府提議與經費挹注下，「聯合國人類安全信託基金」(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 在美國紐約設立，㉓繼而 1999 年 5 月由加拿大倡議與 11 國共同成立「人類安全網絡」(Human Security Network)，以及 2001 年在美國紐約成立的「人類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等，㉔透過這些機構與聯合國的合作下，已經使共同維護人類安全、人權獲得普遍的共識。而 2002 年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的成立，更是與加拿大政府對簽署 1998 年《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極力推至有關。2000 年 9 月，加拿大政府對更是宣布建立獨立的「干預和國家主權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該委員會更於 2001 年 12 月提交了一份名爲國家《保護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 的報告。㉕

加拿大政府在其擔任非常任理事國的兩年間，致力於人權建制的擘建，試圖建立一種人權價值的國際共識，㉖這種行使人權的外交政策很難將其與國家經濟、權力拓展有關，或只能視其對人權理念的維護，當作一種國家利益。而這股理念源自於 1994 年盧安達大屠殺事件的影響。當時擔任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加拿大籍 Roméo Dallaie 上校，

註㉓　此基金是用來贊助聯合國機構進行與人類安全相關的計畫。透過日本政府的積極推動，甚至擴展至「東協」、「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亞太經合會」。Yukio Takasu, "Toward Effective Cross-sectoral Partnership to Ensure Human Secur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Third Intellectual Dialogue on Building Asia's Tomorrow*, June 19, 2000, Bangkok, http://www.mofa/go.jp/policy/human_secu/speech0006.html；或參考宋燕輝，「人類安全的概念、國家發展與國家實踐」，**人類安全**（台北：台灣心會，2004 年）。

註㉔　此委員會是由前「聯合國難民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日籍專門委員 Sadako Ogata，以及諾爾經濟獎得主 Amartya Sen 所推動成立，其宗旨在於促使國際社會接受人類安全之概念，確認構成人類安全之重要與普遍威脅，並擬訂具體行動計畫，達到實際成果，可參考其網站 http://www.humansecurity-chs.org/。

註㉕　本部分《國家保護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尚留待本文第參章節討論。

註㉖　Edward C. Luck, *UN Security Council: Practice and Promise*（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84~85.

在事件後的一份針對盧安達人道報告中，沉痛呼籲國際社會喚醒對人性價值的良知。㉗此後加拿大政府在 1996 年將「人類安全」定爲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並對國際難民營的保護措施採取了多邊國際合作手段。尤其在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改選之際，加拿大「外交事務暨國際貿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在其內部展開多次重要會議討論，最後做出以「人類安全」爲施政優先政策。㉘準此，有別現實主義強調國家視發展目標、權力基礎、權力運作與利益爲外交手段的本質，加拿大政府顯然在其外交政策上並非如此，而只是利用其身份去形塑，正回應了「權力的分配意義很大程度是由利益分配建構，而利益來自規範的塑造，並引導國家行爲」。㉙按現實主義觀點，儘管國際規範結構來自體系內權力最強者所創造，並由強權所界定，不過在國際人權維護行動上的實踐表明了「規範、理念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並非如此簡單。本文以下將繼續透過《國家保護責任》的報告分析，闡述理念與話語權力的改變與操作，藉以探討「規範、理念與權力」三者間的關聯。

參、國際規範的新方法：一個「保護責任」

20 世紀末期以來，發生在盧安達、索馬利亞及波斯尼亞等地的人道干預，一直都存在著爭議。對行動抱持正面者認爲，這種行動主義是人類良知國際化的體現，國際社會應普遍支持；持否定態度者則認爲，人道干預是對從屬於國家主權的國際性秩序與各國領土不可侵犯的破壞，各國應該盡量避免。㉚有鑑於此，爲增強干預之合法性，1999 年、2000 年的聯合國大會會議上，當時聯合國秘書長 Kofi Annan 緊急呼籲國際社會，強調國家主權不應成爲人道救助的障礙，㉛並要求設法一勞永逸地就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達成新的共識。㉜ Annan 指出：「如果人道主義的干預眞的是對主權的一種無法接受的侵犯，那我們應該怎樣對盧安達與斯雷佈雷尼察 (Srebrenica) 作出反應呢？對影響我們共同人性的各項規則的粗暴與有系統的人權侵犯，我們又該怎樣作出反應

註㉗ Roméo Dallaie and Brent Beardsley, *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 (Toronto: Random House, 2003); S. Neil MacFarlane and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4~175.

註㉘ *Ibid*., p. 174.

註㉙ Finnemore, "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p. 157; Wendt, *op. cit*., pp. 96~113.

註㉚ 相關論述請參考：Robert F. Gorman, "Introduction: Refugee Aid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Context," in Robert F. Gorman ed. *Refugee Aid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3), pp. 1~11; Macalister-Smith, *op. cit.*, pp. 15~18; John Prendergast, *Frontline Diplomacy: Humanitarian Aid and Conflict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p. 4~5; John J. Merriam, "Kosovo and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3, No. 1 (2001), pp. 111~154; Steve G. Simon, "The Contemporary Legality of Unilatera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1993), p. 153.

註㉛ Kofi Annan, "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The Economist*, Vol. 352, No. 8137 (1999), p. 49.

註㉜ 相關資料請參考聯合國網址：http://www.un.org/largerfreedom/。

呢？」㉝

對此，2000 年 9 月，加拿大政府對 Annan 的呼籲作出了回應，宣布建立獨立的「干預和國家主權委員會」（ICISS），而該委員會於 2001 年 12 月發布的《國家保護責任》（R2P）報告，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響應。㉞報告的中心議題（central theme）是「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俗稱爲 R2P），即主張主權國家有責任保護本國公民免遭可以避免的災難、免遭大規模屠殺與免遭饑餓，若國家無此能力，必須由更廣泛的國際社會來承擔這一責任。㉟

一、「保護責任」的核心內容㊱

有關「保護責任」的核心內容，以下彙整爲：（一）基本原則、（二）責任要素、（三）軍事干預、（四）正確的授權等原則。

（一）基本原則

1.國家主權意味著責任，而且保護本國人民是國家本身的職責。

2.一旦人民因內戰叛亂鎮壓或國家陷於癱瘓，且當事國家不願或無力制止或避免而遭受嚴重傷害時，不干預原則要服從於國際保護責任。以上指導原則的基礎，主要來自主權概念中固有的義務、聯合國憲章第二十四條中所規定安理會的職責，以及人權法與國際人道法的具體法律義務。

（二）責任要素

1.預防的責任，消除使人民處於危險與危機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易言之，保護責任意味著一個附帶的預防責任（an accompanying responsibility to prevent），即預防責任是主權國家與其國內社會和機構的責任。其法源來自聯合國大會和安全理事會 2000 年通過決議，承認聯合國各個系統在衝突預防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特別小組報告」（*Report of the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以及聯合國秘書長 2001 年「預防武裝衝突報告」（*the Secretary-General on Prevention of Armed Conflict*）中皆指出，預防的責任是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九十九條賦予，特別授權秘書長得將其認爲可能威脅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㊲

註㉝　"I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s, indeed, an unacceptable assault on sovereignty, how should we respond to a Rwanda, to a Srebrenica - to gross and systematic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that affect every precept of our common humanity?" cited from Thomas Weiss, "The Sunset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a Unipolar Era," *Security Dialogue*, Vol. 35, No. 2（2004）, pp. 135~153.

註㉞　相關資料請參考 ICISS 網址：http://www.iciss.ca/menu-en.asp。

註㉟　For a more extended discussion, please go the website of ICISS at http://www.iciss.ca/menu-en.asp or R2P Coalition at http://r2pcoalition.org/component/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註㊱　For a more extended discussion, see ICISS, the repo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註㊲　*Ibid.*, pp. 19-23.

2.作出反應的責任，採取適當措施對緊迫需要的局勢作出反應，其中包括禁運、國際公訴，以及進行軍事干預等強制性措施。

3.強調重建的責任，尤其在軍事干預之後所提供恢復重建與和解的全面援助，消除造成傷害的原因。

（三）軍事干預

當面臨以下兩種嚴重不可彌補的危害時，才可以進行軍事干預。

1.已經發生或擔心發生大規模傷亡，不論是否存在種族滅絕的意圖。

2.已經發生或擔心發生大規模種族淨化，不管實施手段爲何。

3.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採取強硬措施，便不能使干預奏效時。

4.比例原則，以均衡方法計畫出實施的干預規模、期限，其強度不應超出確保實現保護人類目標的需求。

（四）正確的授權

1.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採取任何軍事干預行動之前都應事先得到安理會的授權。請求干預者應正式要求給予此類授權，或者由安理會本身主動提出或者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九十九條的規定由秘書長提出。

2.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應該達成一致意見，當事件不影響其本國切身利益時不行使否決權，且該決議得到大多數國家支持時不得橫加阻撓。

3.如果安理會拒絕有關建議或未在合理的期限內審議，則可選擇其他替代方案。

4.可根據「聯合一致共策和平」的程序召開聯大緊急特別會議審議。

5.地區或區域組織根據憲章第八章規定在管轄區內採取行動，必須請求安理會予以授權。

二、「保護責任」的法源基礎㊳

「保護責任」法源派生於《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對於和平之威脅與破壞及侵略行爲之應付辦法」，被聯合國視爲習慣國際法中的一種「新實踐」(emerging practice)，㊴其法源甚至可追溯安理會更早的 688 與 794 號決議文，㊵兩決議文具有接續的特點，隱含「當一國的動亂造成大規模對人權的剝奪時，構成對國際和平之威

註㊳ *Ibid.*

註㊴ A.P.V. Ro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Vol. 27, No. 3 (2004), pp. 725~736; ICISS, the repo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註㊵ Nation United, S/RES/0688 (1991); S/RES/0194 (1992).

脅，因此針對此情況使用武力成爲合法」。㊶2004 年聯合國大會與 ICISS 報告更指出需視「保護責任」爲國際社會中的新規範（emerging norm）。㊷近年來，安理會本身依此原則採取行動最明顯的即是在索馬利亞行動上，並遵照《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採取強制行動，同時「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ern African States, ECOWAS）對利比亞和獅子山實行的干預行動，亦證明了這類「合法性」問題。

準此，這種旨在保護人類的安全、生命的原則，形塑國際社會的新規範，同時得到了國際法的廣泛探討，強調「保護責任」包括可能派生於《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對於和平之威脅與破壞及侵略行爲之應付辦法」的職責責任和職權。另一方面，這些法源基礎還包括基本的自然法原則，例如《憲章》中的人權條款、《世界人權宣言》以及《種族滅絕公約》關於國際人道主義法的《日內瓦公約》和《附加議定書》、《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及其他一些國際人權和人類保護的協議和公約。

2005 年 9 月，英國、日本、加拿大、紐西蘭、南非、歐盟、盧安達以及肯亞等提案，在聯合國舉行的「2005 高峰會議」（2005 UN Summit）得到 150 多個國家政府首腦的表明支持，並通過有關「保護責任」的 A/RES/60/1 號決議，將「保護責任」規範在 4 種罪行：包括「滅絕種族（genocide）、戰爭罪（war crimes）、違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以及種族淨化（ethnic cleansing）」，強調國家主權有一種保護其所有公民的責任。㊸爲此目的，當和平方式證明是不合時宜，以及國家當局明顯無力維護時，願意通過憲章二十四條讓安理會採取及時決定性的集體行動。㊹

以下本文將以「保護責任」與「國際人道干預」兩面向分析，探究理念與話語權力的改變與操作，強調這種有關保護人類的軍事干預的辯論演變，在《憲章》簽訂以來的 60 年間，其演化與操作在實際國家慣例之間存在的差距，確有越來越縮小的事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組織以及安理會的先例，均已表明已出現一個新的指導原則。

註㊶　1991 年 4 月 5 日通過的 688 號決議本身並不能爲多國部隊干涉伊拉克的行動提供合法的根據，它並不是安理會根據憲章第四十二條實施的人道主義措施的先例。就算多國部隊的行動可作爲一種國家實踐，但其對發展習慣國際法的法律意義而言，當時只能作爲一個先例、被普遍接受的結果；然而安理會在 1992 年 12 月 3 日通過的 794 號決議，讓索馬利亞的軍事行動，則算是眞正的人道主義干涉的實踐。在該決議中，安理會授權使用武力以恢復索馬利亞的「和平、穩定、法律和秩序」。故有學者認爲 794 號決議構成了對《聯合國憲章》的實際修改，它迎合了人道主義干涉的需要，因爲在後冷戰時期更加需要這樣的干涉。Makumi Mwagiru,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Lesson of Somalia,” *Ind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1994）, p. 43.

註㊷　See A/RES/59/565, para. 203.

註㊸　Alicia L. Bann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U.N. World Summit and The Question of Unilateralism,” *Yale Law Journal*, Vol. 115（2006）, pp. 1157~1164.

註㊹　See A/ RES/59/565, para. 203.

肆、理念與話語權力在國際人道問題上的改變與操作

現代主權論儘管在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經歷 400 年依舊不衰，但今日全球互賴結構下，人權議題、人道主義、國際法與國際社會規範等錯綜複雜，主權爲最高權威分配價值理念和原則已開始調整。不管是二戰時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殺虐、1970 年紅柬（Khmer Rouge）在柬埔寨、皮諾切（Pinochet）在智利的殘殺、1990 年代科索沃事件與盧安達大屠殺，都是違背人道與人類價值的行徑。國際社會在面對人權、人道問題時，先會以言語而非物質的制裁與規勸，這些話語的力量是國際人權維護的主要核心，或許話語被認爲不甚值錢、誠意不足，但是這些話語也不是完全都免費的。㊺學者 Jack Donnelly 認爲言語在人權政策上與其他利益是一樣重要與適當的工具，不只對國家在國際規範環境產生衝擊，也會影響國家未來行爲。㊻

近代國際政治中最爲爭議是「人權」與「主權」位階的爭辯，早期兩者不論是從政治面或法律面皆被視爲完全相互對立的理念，㊼隨著兩極對峙結束，當代國際關係不乏學者針對兩者間關係是衝突，抑或調和問題進行探究，其中最凸顯兩者爭議即是「人道干預」的議題。對「人道干預」的定義，一般分爲廣義與狹義說法，狹義上往往係指無論有無得到當事國授權而施以武力干預，用以防止大規模的人權迫害或種族淨化。㊽而廣義則區分兩種定義，一是上述定義，二則是指一種「人道協助」（humanitarian service），在他國領土上直接提供醫療、糧食、庇護等措施，㊾前者之主要行動者多半爲依恃著武力達成干預的主權國家；後者主要行動者較常由組織、團體等非國家行爲者組成，斯類行爲亦稱爲「人道救助」（humanitarian aid）、「人道援助」（humanitarian assistance）。㊿針對後者「救助」或「援助」部分，國際社會普遍抱予支持態度，相形之下，施以武力干預，直入他國境內，用以防止大規模的種族淨化，就受到許多爭辯議論。在這辯證過程中，對人道干預辯護的學者，提出人道干預並非是與主權相悖，而是藉由國際規範進一步保障人權，幫助個人免於生存威脅的恐懼，

註㊺ 例如小孩或先生常常會因爲母親或妻子的一而再、再而三提點、嘮叨，而改變日常生活中的陋習，或可說明話語在形塑規範上的意義。

註㊻ Jack Donnell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5~166.

註㊼ Matthew S. Weinert, “Bridging the Human Rights-Sovereignty Di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8, Issue 2（2007）, pp. 5~32.

註㊽ Mary Kaldor, *Human Security: Reflections 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vention*（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 17; Eric A. Heinze, “Maximizing Human Security: A Utilitarian Argument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5, Issue 3（2006）, pp. 283~286.

註㊾ Justin Conlon, “Sovereignty vs. Human Rights or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Race and Class*, Vol. 46, No. 1（2004）, p. 76.

註㊿ Peter Macalister-Smi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Dordrecht: Martinus Nijoff, 1985）, pp. 3~4.

使其重回正常生活，有助區域與國家的安定，這是《聯合國憲章》中所確保權利與必須捍衛的價值。㊶若以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角度來看人道干預問題，強調功利主義是依據某種價值或利益的角度來看待人類行動的結果，以判斷其行爲的道德性，而其所依據的原則是用福祉（welfare）與快樂（happiness）來衡量利益和價值的最大化，如此之下，道德原則可以訴諸武力干預，限制某種危急情勢。㊷

除了上述支持人道干預論述外，批判學者認爲人道干預無法跳脫國家武力使用的合法性，更點名指出人道干預與帝國主義擺脫不了關係，干預是大國自私的政治利益，假借人權之名，濫用人道干預之實，尤其國家在提倡人權、解救受害者通常是依照國家的喜愛來選擇，因此不受大國喜愛的受害者將會被忽視與遺忘。尤有甚者，人道援助往往助長國家動亂與內戰機會，像是在伊索比亞與盧安達，眞正援助的受益者是境內叛軍而不是難民百姓。㊸

針對人道與干預的調和問題，《國家保護責任》報告做出了將「干預」轉變成「保護責任」的用語說明。強調傳統國際政治在主權干預的辯論上，是以「人道主義干預」（the right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和「干預權」（right to intervene）的措辭語言，如此論述卻造成幾個問題，首先是時效性問題，當使用「干預」字眼時，往往會討論合法性問題，並會受制於被干預國的要求和特權，而導致急迫需求的目的無法達到。其次，這種「干預」論述會讓國際社會只關注在干預行動與行爲上，而未能充分考慮事先預防或後續援助的需求。故 ICISS 的觀點即是不強調「干預權」，而是放在「保護責任」，讓用詞改變，也讓理念改變。㊹此外，ICISS 改變措辭的用意亦強調只有在有關國家不能或不願履行這一職責，或者其國家本身即爲施暴者，則國際社會才能承擔在其發生地點採取行動，排除「干預」和「主權」之間的用語對抗性，並呼籲「保護責任」也注重在事先的「反應」、「預防」與事後的「重建」責任。㊺

註㊶　相關論述請參考：Robert F. Gorman, “Introduction: Refugee Aid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Context,” in Robert F. Gorman ed. *Refugee Aid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3）, pp. 1~11; Macalister-Smith, *op. cit.*, pp. 15~18; John Prendergast, *Frontline Diplomacy: Humanitarian Aid and Conflict in Africa*（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p. 4~5; Steve G. Simon, “The Contemporary Legality of Unilatera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1993）, p. 153.

註㊷　Heinze, “Maximizing Human Security: A Utilitarian Argument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p. 287.

註㊸　相關論述請參酌：Conlon, “Sovereignty vs. Human Rights or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pp. 95~96; Dino Kritsiotis, “Reappraising Policy Objections to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9（1998）, p. 1031; Sarah K. Lischer, *Dangerous Sanctuaries: Refugee Camps, Civil War, and the Dilemmas of Humanitarian Aid*（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17; Jessica P. Simmons, “Learning to Live With NGOs,” *Foreign Policy*, No. 112（1998）, pp. 82~96.

註㊹　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2001）, pp. 16~17.

註㊺　Shahrbanou Tadjbakhsh and Anuradha M. Chenoy, *Human Security: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London: Routledge, 2007）, p. 193; Laura Neack, *Elusicve Security: States First, People Last*（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pp. 210~212.

「保護責任」的設計係針對國際社會中的人道救援與干預，藉由保護之名，行干預之實，學者 Shahrbanou Tadjbakhsh 與 Anuradha M. Chenoy 即認爲「保護責任」機制的設計連結了人道干預與人類安全關係，並延展了人類安全的內涵，傳統國際社會對於人道干預的論點主要在於，「干預」是使國際組織或區域組織致力於關注人們「免於恐懼」(freedom from fear) 與人權的維護，而「保護責任」機制則授予合法與正義的要素，一種「正當防衛」(just cause) 性的施予，讓國家有義務與責任去保護正處災難的人民，擴大了人類安全在執行面的效力。[56]尤其 ICISS 在「保護責任」機制上的設計用意，從「保護責任的基礎」觀之，除了保有主權概念中固有的義務外，強調國家主權在保護責任上的義務，亦將「保護責任」視爲一種國際義務，並以聯合國憲章第二十四條「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聯繫。[57]

《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可視爲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修補，[58]同時以安全研究的角度而言，是一種使人類安全與國家安全的連結，[59]這是由於傳統國家主權概念下，保護其國民的責任在於主權國家的本身。但冷戰的結束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促使安全的概念有所調整，戰爭的型態或性質在冷戰結束後與過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像是一國內戰、叛亂地區、失敗國家等，[60]使得「主權不容干預原則」有讓渡給「保護責任」原則的探討空間。「保護責任」是新興的國際規範，內容是說國家擔負首要的責任，保護其國民免於滅絕種族、戰爭罪、違反人道罪以及種族淨化，[61]但是當國家無力保護其國民時，保護責任就落在國際社會。

儘管按現實主義觀點國際規範結構來自「權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不過弱國卻可以尋找一種國際社會可接受的意識形態來限制大國規範，[62]譬如上述提及的加拿大利用其在安理會的職位形塑人權價值一例，即構成 Martha Finnemore 與 Kathryn Sikkink 所稱的規範企業化 (norm entrepreneurs) 形態，[63]即透過包括國際組織、國家、知識社群 (epistemic community)、非政府組織等力量去說服國家接受新規範，進而達到 Jürgen Habermas 宣稱的溝通行爲 (communicative action)，在溝通中只有較好

註[56] Tadjbakhsh and Chenoy, *op. cit.*, pp. 198~201.

註[57] Georg Frerks and Berma Klein Goldewijk, *Hum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ecurity* (Wageningen: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7), p. 32.

註[58] Laura Neack, *Elusicve Security: States First, People Last*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pp. 191~218.

註[59] *Ibid.*, p. 209.

註[60] 蔡育岱、譚偉恩，「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 (2008 年 3 月)，頁 151~188。

註[61] *Supra* note 36.

註[62] Nicholas J. Wheeler, "The Humanitarian Responsibilities of Sovereignty: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Norm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for Humanitarian Purpos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Jennifer M. Welsh e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6), pp. 30~32.

註[63]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87~917.

的論據才具力量，這種強調在一個實際的對話活動中，所有參與者都認可的那些規範才能被認爲是有效的規範，且都具有被接受的可能性，故實際的決定權在於對話的參與者。⑭易言之，這種將「干預」轉變成「保護責任」的話語力量，任何原則的有效性，都必須透過人類的對話來達成協議，透過溝通達成協議，非要消除彼此差異，而是進一步促使相互瞭解。《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是一種干預形式的移轉，同時是目的也是手段，讓國家有權力去干預，⑮象徵一種「辯論用語的改變」（shifting the terms of the debate），以及話語力量的形成。⑯2008 年 2 月 14 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於紐約「全球責任保護中心」（the Global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成立大會時呼籲，適逢《世界人權宣言》60 週年，各國應採更積極態度去面對《國家保護責任》；⑰此外，潘基文並於 2008 年 9 月 23 日聯合國第六十三屆大會揭幕典禮演說：「對抗瘧疾、愛滋病等疾病，保障人權的提升、確保各國對所有脆弱的人群履行『保護責任』的理念」。⑱在在顯示《國家保護責任》透過象徵權力的聯合國正形成一股話語力量，而本文以下將論述《國家保護責任》如何藉由聯合國體制下進行規範的改變與操作。

伍、聯合國與《國家保護責任》：規範的改變與運用

國際社會對人道干預採取的反對立場，並非針對人道維護問題，而是干預時武力使用的合法性問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問題，在國際社會一直具有爭議性，《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明確禁止會員國彼此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只允許有兩個例外：第五十一條的自衛權，以及安全理事會針對「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爲」（第七章）批准（以及由此類推區域組織根據第八章批准）的軍事措施。儘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各會員國使用武力亦多達數百次，第五十一條很少能爲之提供令人信服的假定理由。最顯著的例子即是 1999 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行使人道干預的行動，當時空襲南斯拉夫的行動，曾引起全球的矚目，有人質疑攻擊的合法性，認爲此項軍事行動應予譴責，因北約未獲安理會授權而逕行以人道救援之名，行使軍事干預主權國家內政之實。換言之，北約這項人道干預行動的法律程序是有嚴重瑕疵及合法性基礎與否的問題。然

註⑭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London: Heinemann, 1984）, p. 285.

註⑮　*Supra* note 57, p. 191.

註⑯　S. Neil MacFarlane and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61.

註⑰　請參考網址：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8/sgsm11419.doc.htm。

註⑱　請參考網址：http://www.ens-newswire.com/ens/sep2008/2008-09-23-03.asp。

而，就某種程度而言，大多數聯合國會員當下卻接受了 NATO 不合程序的出兵舉措，原因在於 NATO 技巧性使用「道德」、「種族大屠殺」的立場獲得會員國們的共識。⑲故當時國際法院法官辛瑪（Bruno Simma）曾言：「從國際實踐來看，基於人道考量所進行的干預，固難予以合法化，然有鑑於這種緊急情況以及其它適時有效的救援無可期之下，國際社會仍傾向對該項行爲予以相當程度的容忍。」以此觀點來看北約組織空襲南斯拉夫的行動，恰似有其正確性。⑳

不可諱言，冷戰的結束，聯合國在維護國際社會安定與秩序上往往顯得力有未逮，㉑針對鄰國威脅而以自衛爲由先發制人或發生於一國境內大規模暴行事件，在不牴觸以及調和《憲章》第二條第四款與第七款之下，2004 年聯合國「威脅、挑戰和改革問題高級別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在《一個更安全的世界：我們的共同責任》（*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報告中，㉒埋下一個「主權與責任」關係的伏筆，一種國家「保護責任」規範的改變，強調各國所簽署的《憲章》，除了象徵擁有主權帶來的各種特權外，亦需接受由此產生的各種責任，而這責任顯然有別於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的國家主權概念，是以一國需保護其本國人民福祉的義務，以及向國際社會履行之義務；易言之，「主權與責任」關係的改變，使主權國家具有「保護責任」，若視主權國家爲一種制度，則「保護責任」即爲約束制度中的規範成分之一。

然而，如果國家沒有能力或不願意這樣做，廣大國際社會就應承擔起這一責任，並由此開展一系列工作，包括預防工作，並在必要時對暴力行爲作出反應，由安全理事會在萬不得已情況下批准進行軍事干預，以防止主權國家政府沒有力量或不願意防止的種族淨化或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行爲。㉓聯合國這種對《國家保護責任》的操作，隱含其對主權與人權關係的重新詮釋。其中人道干預的概念起源於 19 世紀，當時被視爲一種違法性的國家行爲，㉔不過學者 Martha Finnemore 曾經系統歸納指出，㉕人

註⑲ Jun Matsukuma, "Emerging Norms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Seinan Law Reviews*, Vol. 38, No. 2（2005）, pp. 106~118; Thomas M. Franck, "Interpretation and Change in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J. L. Holzgrefe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ical, Legal, and Political Dilemma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6.

註⑳ Rogers, APV.,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No. 27（2004）, pp. 725~736.

註㉑ 自 1948 年至今，聯合國總共採取了 60 個維持和平行動，其中自 1988 年迄今就佔了 47 個。See United Nations website at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list.shtml（last visit on 10 Sept. 2009）.

註㉒ See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59/565.

註㉓ 請參考網址：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04/602/30/PDF/N0460230.pdf?OpenElement。

註㉔ Thomas M. Franck, "Interpretation and Change in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J. L. Holzgrefe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ical, Legal, and Political Dilemma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25~226.

註㉕ Martha Finnemore 分析了 19 世紀歐洲的人道干預行動，希臘獨立戰爭（1821-1827）、黎巴嫩與敘利亞衝突（1860-1861）、保加利亞內亂（1876-1878）與亞美尼亞屠殺（1894-1917），說明人道干預的演進。*Supra* note 7, pp. 162~170.

道干預的規範在過去 50 或 100 年間，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可見，並且強而有力（more visible and more powerful），尤其是在非殖民化與民族自決部分，主要在於歐洲人對「人類」一詞的重新定義與普遍化，強調對人性的尊嚴，間接影響了主權與人道主義的關係。換言之，主權與人道主義皆是人道干預其中必要的組成部分，[76]故在《國家保護責任》的基本原則部分即強調「以上指導原則的基礎，主要來自主權概念中固有的義務、[77]聯合國憲章第二十四條中所規定安理會的職責，以及人權法與國際人道法的具體法律義務。」[78]一般而言，人權比人道干預在目前普遍國際社會獲得較持正面的看法，癥結在於「武力使用」涉及一國主權不容干預性質，而《國家保護責任》則可視爲聯合國合法授予的法源基礎。從人權建制與人權法體系的建立來看，聯合國國際人權建制在 2000 年後更臻成熟，其中兩項重大成就係屬 2002 年「國際刑事法院」[79]與 2006 年「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 HRC）[80]的成立。以前者而言，「國際刑事法院」於 2002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其背景來自於聯合國與各國在冷戰後對非洲、前南斯拉夫的人道干預，[81]後者則是修補原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功能。此兩人權建制顯示了當代聯合國在處理人權議題的轉變，已明顯由最初「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以及其附屬專門機構之權責，[82]轉而透過「保護責任」的建制讓安理會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易言之，此建制可說是對《憲章》的一種修補，畢竟《憲章》在如何拯救國家境內民眾的生命方面，原本是無較具體作出更爲明確的規定。除了「重申基本人權之信念」外，憲章幾乎沒有規定什麼措施來保護這些人權。因此，

註[76]　*Ibid.*

註[77]　這種固有義務即是所謂「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深層意涵，牽涉人類與國家早期的密切關係。國家概念隨著 1648 年《西伐利亞條約》（Westphalia Treaty）的簽訂和「列國制度」（Modern State System）誕生而形成，其後 Thomas Hobbes 在其 1651 年**巨靈論**（*Leviathan*）一書中做了進一步的闡釋，指出當人類生活在無時無刻不相互爲戰的自然狀態中時，環境逼得人類不得不去思考如何跳脫這種安全稀缺及沒有安全感的生活，此時人類的理性開始運用，而想出改進自然狀態的方法就是每個人的行爲都要受到限制，於是文明社會的契約概念出現，人與國家皆是對等的權利義務關係。蔡育岱、譚偉恩，前引文，頁 162~163； MacFarlane and Khong, *op. cit.*, pp. 6; 20; 58~59.

註[78]　See ICISS, the repo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Synopsis, p. XI.

註[79]　嚴格而言，還有兩個國際法庭，是通過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建立起來的，一個是「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另是「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它們主要管轄的是在該地區實施的大屠殺、種族滅絕等罪行。蔡育岱、譚偉恩，**現代國際公法精義**（台北：晶典出版社，2006 年），頁 342。

註[80]　其成立主要在於修補原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功能的不彰，在「人權理事會」成立後，「人權委員會」旋即終止職權。

註[81]　「國際刑事法院」所起訴和懲罰包括下列四項嚴重罪行的人：1、滅絕種族罪（genocide）；2、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3、戰爭罪（war crimes）；4、侵略罪（aggression）。「國際刑事法院」目前正受審四個國家的案子：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烏干達（Uganda）和蘇丹達佛（Darfur, Sudan），以及中非共和國（Central African Republic）。請參考相關案件網址：http://www.icc-cpi.int/cases/RDC/c0106.html。

註[82]　例如原本的「人權委員會」、「人權理事會」與「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國際社會長期以來一直有爭執，一方面是堅持「有權干預」人爲的災難，另一方面則是爭辯儘管第七章授權安全理事會「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但不得授權對主權國家採取脅迫行動。所幸《國家保護責任》適時的提出，解決這類問題。尤其在其基本原則的部分，強調「一旦人民因內戰叛亂鎮壓或國家陷於癱瘓，且當事國家不願或無力制止或避免而遭受嚴重傷害時，不干預原則要服從於國際保護責任。」[83]

早期國際人權保護內涵實爲一種無法律拘束力的概念，呼籲訴求性質大於實質推行，不過這種具備呼籲性質的規範，在隨時間與強化後，轉而爲具有強力規範性質的法律條文。從聯合國人權法體系的建立、人權建制日趨完備，加上對人道干預賦予法源之《國家保護責任》的成立，象徵一種人權理念上的變革，強調權利的獲取來自人性的價值，世人透過對人權重視與反應，實際操作在制度上的落實。本文闡述至此，主要強調形成國際規範的結構與組織，對人權、人道干預、人類安全等規範的考察表明，規範的制度性對於規範的演進甚爲重要，這些規範在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歐盟，甚至北約）中的制度化與擴散，使得規範主張更進一步具有效度與信度，當然國際規範結構是由最強者建構，但具體來說，從人道主義的干預看來，國際社會並不明顯完全服務於最強者的利益，[84]至少自人權建制、人道主義實踐來看，規範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如此簡單。

陸、結　論

本文試著闡述 Carr、Morgenthau 以降的現實主義論點，可能在冷戰後的人道干預實踐上已經呈現解釋力不足現象。強調即使是強權國家也會尋求他國以及自身國內公眾的認可，而如果一個國家無法對其行爲提出有效的辯護，在國際社會即會失去正當性。因此，如果是西方強權想利用人道主義來遮掩其實際現實的政治利益，那將難解釋其國內輿論，以及上述「規範企業化」形態因素。例如美國在索馬利亞的行動中，索馬利亞對美國並未有戰略或經濟上利益，然而當時美國國內輿論在人道規範上所反映「CNN 效應」的媒體影響力，卻逼迫美國去回應輿論壓力，進而採取軍事干預行動。顯示了物質主義論者忽略國家決策者可能因自身認同而接受新規範，或者是來自國際社會或國內輿論，使得國家羞愧於其對人道威脅的無視。

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一項文化與制度的存在是促使國家對自我身分與利益進行修正的觸媒，並有可能進而塑造該國具體的安全利益與安全政策施行，[85]遵照建構主義

註[83] *Supra* note 79.

註[84] 對於後冷戰國際社會在非洲索馬利亞、烏干達、盧安達、蘇丹、辛巴威，以及波斯尼亞、海地等人道干預來看，干涉的動機與目的很難表明跟地緣戰略、能源戰略、大國權力平衡有關。

註[85] 袁易，**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的觀點**（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 年），頁 39；D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i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2~53.

的主張，能動者可以建構或是解構一種結構，而此結構是一種「理念」的分配，而非結構現實主義所強調的「物質」權力分配。換言之，物質因素必須透過理念上的認知才可能對能動者的行爲產生有意義的影響，能動者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便是透過這種理念上的認知來定位自己與他者的身分，進而決定彼此的互動關係。[86]同時國家互動中的國際環境同時包含社會與物質雙面向，但是理念才是決定國家對自身利益界定的基礎要素，國家透過體系層次的互動來改變其身分認知，轉而形成國家間的集體身分，產出有利互助合作的氛圍或條件。[87]本文主張，現實主義等物質論者的論點不足以解釋 1990 年代安理會對干預實踐的轉變。相較之下，《國家保護責任》倡議顯示了當代人權政策不只是簡單的理念對利益的展示，而是展現了理念在重構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力量，對人權政策的採納，不代表對國家利益的忽略，而是反映了國家長期利益產生變化，喚醒主權國家的義務與責任，亦即「我們所要保護的正是反映了我們的所要堅持的價值」（What we seek to protect reflects what we value）。[88]

後冷戰的國際局勢，強調一種「保護責任」在國際社會中規範性移轉（normative shift），[89]事實上從國際社會對人道干預的舉措來看，國家在決策的過程是呈現冗長與複雜，然而卻也可以發現以這種「保護責任」的政治詞彙逐漸受到普遍公眾的接受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90] 2009 年 1 月 29 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在其一份名爲「執行《國家保護責任》」（*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秘書長報告書」（*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中呼籲聯合國各會員國落實《國家保護責任》，[91]再次強調國家主權有一種保護其所有公民的責任，尤其 2009 年 9 月 14 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文，[92]在第 138、139 段中更具體明文了有關「保護責任」的內容，凸顯國際社會對維護「人性價值」的重新思考與重視。當一種國際規範擴散至國家，在國家呈現的反映（抵抗或服從）中，其實已經不斷建構身分、形塑認同，彼此產生社會學習，並具社會化的機制。本文認爲國際社會目前對於人道干預主要採反對立場，

註[86]　Wendt, *op. cit.*, pp. 140~142.

註[87]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 407;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1994）, p. 384.

註[88]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4）, p. 17.

註[89]　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2001）; Nicholas J. Wheeler, *Saving Strange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land Dannreu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Contemporary Agenda*（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p. 46~48.

註[90]　Edward C. Luck, *Un Security Council: Practice and Promise*（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91.

註[91]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12 January 2009,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www.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20; http://www.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index.php?module=uploads&func=download&fileId=655.

註[92]　See A/RES/63/308, para. 138~139.

並非是對「人權、人道、人性」本身的價值否定，而是在「合法的使用武力」上比較具爭議，故如果將《國家保護責任》本身理念與措施手段區隔，「保護責任」理念的本身應已被國際社會視爲一種規範，俟未來重複實踐並獲得習慣國際法之法律規範特性。[93]

16 世紀國際法學者 Francisco Suarez 曾說過：「人類雖分成多種民族國家，但在整體上卻是一體的，儘管表面上每個國家皆是獨立而自給自足，但實際上卻無國家可眞正如此運行，每個國家必須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與友善，需要某種共同法律以規範其行爲。」[94]而這種共同的法律規範，作者認爲即是國際社會中對「人性價值」的維持，尤其當全球化進程的發展，人類利益的聯繫會更加緊密。一些新理念、新規範類型會逐步增多，國家權力運用的合法性必須有其他依據，本文認爲這些依據來自國際社會對「主權」應盡的義務與要求，而《國家保護責任》正是針對此之回應。

*　　*　　*

（收件：98 年 10 月 22 日，接受：99 年 1 月 15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93] 作者此處所要呈現的是「責任」與「義務」概念的關係。儘管「責任」觀念似乎偏重於政治道德責任的建構，與建構國際法律規範所產生的「義務」觀念不盡相同，然而「習慣國際法」係指國際社會中已有證據顯示被視爲一種「法律規範」，是國家間對於某種特定情形採用的**某種特定的行為**（即本文主張的規範行爲、干預行爲），在國家長期國際交往中形成「一般、一致的重複實踐」（a general and consistent practice of states），並經由一段時間被多數國家接受（states of similar international acts over time）成爲具有法律拘束的原則和規則，是國際法法源中最古老而重要的基礎。它的形成要件爲：「多數國家」、「持續實行」與「法之確信」（opinio juris sive necessitates），其中「法之確信」爲習慣國際法之核心部分，是國家確認對其具有法律拘束力（心理要素的認識與意識到有法的拘束力存在）。換言之，《國家保護責任》是否已具備成爲習慣國際法中規範的可能性，本文的認知與看法是有朝向這個趨勢的。

註[94] Francisco Suarez, “De Legibus ac de Deo Legislatore,” quoted by John Eppstein 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London: Burns Oates, 1935）, pp. 265~266.

Diffusion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Case of "R2P Initiative"

Yu-tai Tsai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Power and national interest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an be se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ost-war period. A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asserted that "power" determines "national interest." Such a view, however, can result in an excessively restricted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behavior," si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behavior is not necessarily an ironclad one. This has been borne out by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Rather than being driven by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gional strategic concerns, a number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prevent ethnic cleansing, safeguard human rights, and uphold certain other val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Such international values are based on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These values are based on norms restricting the use of power and emphasize that the effective use of power is based on legitimac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plores some of the ideas from which these norms are derived.

Most states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such areas as government structures, material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Some states, however,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upholding the val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pplying certain principles to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promoting the common goo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exploring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relevance of norm, idea, and power, analyzing the legal basis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how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norms is currently being implemented and practi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2P, Norm, Idea, Human Security

參 考 文 獻

中文

甘逸驊，「歐盟柔性強權身分認同的建構與批判」，**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5。

宋燕輝，「人類安全的概念、國家發展與國家實踐」，**人類安全**（台北：台灣心會，2004 年）。

袁易，**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的觀點**（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 年）。

蔡育岱、譚偉恩，「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2008 年 3 月），頁 151~188。

蔡育岱、譚偉恩，**現代國際公法精義**（台北：晶典出版社，2006 年）。

西文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12 January 2009.

Acharya, Amitav,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2004), pp. 239~275.

Annan, Kofi, "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The Economist*, Vol. 352, No. 8137 (1999), pp. 49~50.

Bannon, Alicia L.,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U.N. World Summit and The Question of Unilateralism," *Yale Law Journal*, Vol. 115 (2006), pp. 1157~1164.

Berenskoetter, Felix and M.J. Williams e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Bull, Hedley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84).

Bull, Hedley,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Carr, Edward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56).

Checkel, Jeffrey T.,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1 (1999), pp. 83~114.

Conlon, Justin, "Sovereignty vs. Human Rights or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Race and Class*, Vol. 46, No. 1 (2004), pp. 75~100.

Dallaie, Roméo and Brent Beardsley, *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 (Toronto: Random House, 2003).

Dannreuther, Rol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Contemporary Agend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Donnelly, Jack,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Eppstein, John, *The Catholic Tradi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 (London: Burns Oates, 1935).

Finnemore, Martha, "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3~185.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87~917.

Franck, Thomas M., "Interpretation and Change in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J. L. Holzgrefe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ical, Legal, and Political Dilem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4~231.

Frerks, Georg and Berma Klein Goldewijk, *Hum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Insecurity* (Wageningen: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7).

Gorman, Robert F., "Introduction: Refugee Aid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Context," in Robert F. Gorman ed., *Refugee Aid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3), pp. 1~14.

Habermas, Jürgen,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84).

Heinze, Eric A., "Maximizing Human Security: A Utilitarian Argument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5, Issue 3 (2006), pp. 283~302.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4).

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2001).

Jepperson, Donald L.,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i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75.

Kaldor, Mary, *Human Security: Reflections 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ven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1988), pp. 379~396.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New York: Longman, 2001).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Kravtsov, Vlad, "Understanding Norm Diffusion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Build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Sawyer Law and Politics Program*, December 9, 2005.

Kritsiotis, Dino, "Reappraising Policy Objections to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9 (1998), pp.1005~1050.

Lischer, Sarah K., *Dangerous Sanctuaries: Refugee Camps, Civil War, and the Dilemmas of Humanitarian Ai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Luck, Edward C., *Un Security Council: Practice and Prom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Macalister-Smith, Pet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Dordrecht: Martinus Nijoff, 1985).

MacFarlane, S. Neil and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tsukuma, Jun, "Emerging Norms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Seinan Law Reviews*, Vol. 38, No. 2 (2005), pp. 106~118.

Merriam, John J., "Kosovo and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3, No. 1 (2001), pp. 111~154.

Morgenthau, Hans J., *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 1979).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Mwagiru, Makumi,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Lesson of Somalia," *Ind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1994), pp. 33~44.

Neack, Laura, *Elusicve Security: States First, People Last*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Prendergast, John, *Frontline Diplomacy: Humanitarian Aid and Conflict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Rogers, APV.,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No. 27 (2004), pp. 725~736.

Sikkink, Kathryn, "The Power of Principled Ideas: Human Rights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Europe,"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Simmons, Jessica P., "Learning to Live With NGOs," *Foreign Policy*, No. 112 (1998), pp. 82~96.

Simon, Steve G., "The Contemporary Legality of Unilatera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1993), pp. 117~153.

Simon, Steve G., "The Contemporary Legality of Unilatera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1993）, pp. 117~153.

Snyder, Richard, H.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Suarez, Francisco, "De Legibus ac de Deo Legislatore," quoted by John Eppstein 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London: Burns Oates, 1935）, pp. 265~266.

Tadjbakhsh, Shahrbanou and Anuradha M. Chenoy, *Human Security: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London: Routledge, 2007）.

Takasu, Yukio, "Toward Effective Cross-sectoral Partnership to Ensure Human Secur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Third Intellectual Dialogue on Building Asia's Tomorrow*, June 19, 2000, Bangkok.

United Nation, S/RES/0688（1991）; S/RES/0194（1992）; A/RES/59/565（2004）; A/RES/60/1（2005）; A/RES/63/308（2009）.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Weinert, Matthew S., "Bridging the Human Rights-Sovereignty Di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8, Issue 2（2007）, pp. 5~32.

Weiss, Thomas, "The Sunset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a Unipolar Era," *Security Dialogue*, Vol. 35, No. 2（2004）, pp. 135~153.

Wendt, Alexander E.,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1992）, pp. 391~425.

Wendt, Alexander E.,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1994）, pp. 384~396.

Wendt, Alexander E.,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heeler, Nicholas J., *Saving Strange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Wheeler, Nicholas J., "The Humanitarian Responsibilities of Sovereignty: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Norm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for Humanitarian Purpos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Jennifer M. Welsh e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6）, pp. 29~51.

相關資料網站

ICISS 網址：http://www.iciss.ca/menu-en.asp.

ICC 網址：http://www.icc-cpi.int/cases/RDC/c0106.html.

ICRC 網址：http://www.icrc.org/web/eng/siteeng0.nsf/html/mouvement -date-011006.

R2P Coalition 網址：http://r2pcoalition.org/component/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R2P 報告網址：http://www.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index.php?module=uploads&func=

download&fileId=655.
人類安全委員會網站：http://www.humansecurity-chs.org/.
聯合國「大自由報告」網址：http://www.un.org/largerfreedom/.
聯合國「全球責任保護中心」成立大會潘基文演說網址：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8/sgsm11419.doc.htm.
聯合國「第六十三屆大會」潘基文演說網址：http://www.ens-newswire.com/ens/sep2008/2008-09-23-03.asp.
聯合國「維和行動」網址：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list.shtml.